

· 性别视角下的萧红专题研究 ·

萧红的独立作家意识与性别立场

郭淑梅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 要:“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萧红独立作家意识凸显与创作转型的时间节点。其独立作家意识与她的性别立场分不开,也是促使她与萧军分离,直接影响到她此后创作走向的关键因素。在武汉,萧红首次公开申明文学观点,即“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此后,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香港,她都实践着武汉时期的创作理念。

关键词: 武汉《七月》座谈会;萧红小说学;性别立场;独立作家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7)04-0054-06

一、武汉小朝街《七月》座谈会:萧红独立作家意识凸显

萧红与萧军,一对文坛传奇眷侣,因为日军入侵东北,从哈尔滨逃到青岛,又辗转 to 上海,最终得到左翼文坛盟主鲁迅先生赏识,在上海立足,其保留从事着“阶级题材”的底层文学创作。譬如其《跋涉》《生死场》等,都是将笔触探伸到底层阶级的苦难生活,以揭示旧中国普遍存在的制度顽疾。

由于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在鲁迅先生的引荐下,萧红、萧军结识了大批鲁迅先生身边的文化人,如巴金、茅盾、黄源、胡风等。其中,胡风是一位能力极强的人,既办杂志也从事理论批评又搞文学创作。他把鲁迅先生周围的上海同人聚集起来,在他主持的抗战刊物《七月》名下进行战时创作。1937年9月11日《七月》在上海发刊,出版3期以后,为避战祸,随上海文化界大举撤离,

移师武汉。胡风一家逃离上海,住到武汉朋友金宗武家(在武昌小朝街42号的一栋花园洋房)。

萧红、萧军也乘船抵达武汉。蒋锡金回忆,当时他住在武昌,正与冯乃超、孔罗荪在武汉办《战斗》旬刊,两人除编刊物外还有民政局、邮局的工作,他还同时负责往来印刷所办理杂志事宜。每当活多干不完的时候他们就借住在汉口,在江汉关的检疫船“华陀”号上过夜。检疫官于浣非是哈尔滨蓓蕾社作家,在武汉写诗,在东北军资助的《大光报》兼职。上海战事起来后,武汉接纳了大量难民,检疫官于浣非忙碌起来。蒋锡金偶尔也和于浣非一起检疫,就看到了逃难到武汉的萧红、萧军。于浣非是两萧旧识,便请托蒋锡金替他俩找住处。武昌小金龙巷21号蒋锡金住处,是由4家合租的宅院。蒋锡金租住两间坐西朝东的厢房作为卧室和书房,他出让一间给两萧住。武汉生活安定后,萧红、萧军开始奋力创作。

收稿日期: 2017-04-20

作者简介: 郭淑梅(1958—),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域文化史研究。

• 54 •

汉口、武昌两地跑的蒋锡金,半夜回来后还常看见萧军挑灯夜战,写长篇小说《第三代》。而日常生活轨道的破坏和生活重心的丧失,则给萧红提供了重新清理创作来路的机会,促使其独立作家意识凸显。

胡风主持的《七月》,首先见证了萧红创作上的突围和变化。在全面抗战尚未爆发时,萧红按日常生活方式行走于社会,她与萧军双宿双飞,已是固定的社交标识,是一对著名的青年作家夫妻。萧红有独特的创作观点,尽管与萧军时常争论,但都不脱离特定的私人圈子,尚未在公开场合下得到展示。譬如,1937年6月,两萧在上海,曾因为如何书写用透明的玻璃杯喝水而争得不可开交。当时两人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担当裁判的鹿地亘只好充当和事佬。

战时机缘特殊,文人聚谈频繁,如何发展战时文艺等所有作家面临的新课题在公众场合被逐渐披露,萧红理所当然地掌握了话语权,她独到精辟的见解在公共舞台上突然间被放大。人们惊讶地发现萧红与其他作家,尤其是主张“上战场逞英豪”的宏大叙事作家有着根本不同。

《七月》复刊前,胡风曾设计出刊《战火文艺》,以实现文艺与抗战紧密结合的构想。他在汉口报纸登出《〈战火文艺〉预告》,“后因登记手续不合,被主管机关驳回,故沿用本社(七月社)在上海出版的周刊《七月》原名,重行登记”^[1],“上海出版的《七月》周刊,因为同人大半迁来武汉,从第三期起宣告停刊,加大篇幅到三倍,改成半月刊在武汉出版”^[1]这样一来,《七月》就承担了胡风战时文艺创作阵地的角色。武汉办刊火爆,纸张奇贵,在致读者和作者信中,胡风解释,目前“尚无力向作者致酬,但如果收支相抵尚有赢余,当按照来稿篇幅,平均分配”^[2]。《七月》杂志筹办资金困难,并未影响到同人编稿写作的兴致,其所刊载的民众活动特写、抗日英雄特写、战地生活特写、汉奸特写、地方通讯、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漫画、木刻、杂感、专论等充分考虑战时

文艺“当下性”特点,以及受众群体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原则,力推新人新作,一时之间也是风声水起,极引读者瞩目。

《七月》复刊后,小朝街洋房客厅成为杂志座谈会的最好去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曹白、东平、柏山、田间、艾青、聂绀弩、冯乃超、楼适夷、欧阳凡海、奚如、吴组缃、辛人、宋之的、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一批作家,都是《七月》所依重的中坚力量。胡风在《七月》致辞里写道“在神圣的火线下,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相。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底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底这工作,一方面将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热情里面踊动着、成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要,所监视。”^[3]胡风的理论素养和政治头脑使其敏感地意识到全面抗战爆发后,文艺创作引导大众投身抗日战争的责任。他不赞成对《七月》杂志期待过高,譬如冯乃超认为《七月》应该成为抗战中文艺运动的指导杂志,胡风认为,《七月》无意担当“指导”,不过仍希望《七月》发表的文艺作品能够与战时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1938年1月,《七月》在众多杂志中率先发声,以《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为题,邀集艾青、东平、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冯乃超、田间、适夷、王淑明等,对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文艺创作分析把脉,探讨战时作家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并接受聂绀弩提议,把座谈会作为《七月》办刊的长效机制。由于战局变化,武汉情况不明朗,大部分《七月》同人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邀请下,选择前往临汾,胡风则留在武汉打点杂志的日常事务。直到3个月之后,山西战事亦起,临汾不保,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等人陆续回到武汉,座谈会才得以接续。《七月》杂志在武汉共举办了3次文艺座谈会,影响颇巨,同人参与的其他抗战活动如诗歌朗诵等也很引人注目。更为可喜的是,同人创作成果丰厚,势头

旺盛,“七月派”称号不胫而走,成为抗战文艺中的一支生力军。

1938年3月底,距《七月》杂志发起战时文艺活动研讨过去两个多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成立,“组织救亡宣传,开展街头剧、朗诵诗运动,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发起文艺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讨论”^[4],抗战文艺活动频繁起来。5月4日,萧红、罗烽、白朗等哈尔滨老友相聚,与臧克家、高兰等在汉口鄱阳街“美的冰室”举办诗歌朗诵会,朗诵普希金《茨冈》引起轰动,“屋子里一下子涌进来许多听众,竟挤得水泄不通”^[4]。正是《七月》率先举办的战时文艺座谈,才使萧红在举国上下皆“上战场”的喧哗声中独树一帜,公开表达独立作家的观点。

战时,文艺界最关心的是作家何去何从的问题。《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主要从抗战文艺动态印象、新形式产生问题、作家与生活问题、文艺工作方向等方面展开探讨。东平提出,战时作家生存和写作面临困境。作家不能像原来一样只管关起门来自己创作而不问战事,那样人们会“把你当作特殊的存在”。然而,作家如果与大家一道跟着跑,就没有时间进行文学创作。聂绀弩、冯乃超、淑明、适夷、艾青等都就当时文艺打破旧有的商业文学关系、作家与抗战游离的状态、抗战报告诗集特辑与伟大作品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

萧红对此类问题一直默不作声,但当田间提出现有的文艺活动中“文化人散漫,无中心组织,工作不紧张”的时候,萧红再也坐不住了,对于给文化人下的这种定义,她很不客气地说,“问题太大了!”^{[5] (P193)}

胡风谈到文学的新形式开始会受到拒绝,他以萧红的散文为例证,“萧红的散文,开始的时候,有些人看不懂,田间的诗,到现在还受着非难。但我以为,对于一种新的形式,只要它是为了表现生活,而且有发展的要素,即令它包含有许多弱点,我们也应该用肯定的态度去看它”^{[5] (P194)}。

对此,萧红十分不满。一直以来,她对于萧军等人对她创作的三道四就很反感,上海期间本来她的散文是有很多人喜欢的,可是就在她的家里,她却听到对她散文的质疑。因此,胡风一提到她的散文形式问题,她马上敏感地反驳“说我的散文形式有人反对,但实际上我的散文形式旧得很”^{[5] (P195)}。当有人提出,作家与生活隔离所以作品“空洞化,没有力量”时,萧红也马上反驳“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譬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5] (P195)}。淑明认为,作家不能够打进生活里面,是因为情绪不高涨。萧红马上反驳“不,是高涨了压不下去,所以宁静不下来。”^{[5] (P197)}

很显然,萧红对于文学圈子此时弥漫着的激情式的“上前线”的口号是持反对意见的。萧红的观点与众不同,她始终认为作家就在生活中,而不必非要强调进入生活。由于萧红观点很有道理,难以辩驳,人们不得不随声附和。谁会说自己不是在实际生活里呢?萧红无非是想表明,抗战以来文艺创作不要让过分高涨的情绪“影响到脚踏实地”。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由于黄源夫人,也就是萧红女友许粤华与萧军婚外情事件的公开化,萧红与萧军闹感情纠葛,不愿意原谅对方的背叛。同时,她也考虑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是否可以打回黑龙江老家去的事情。战争使大量刊物停刊,物价飞涨,人们每天都处在逃难心态中,文化人也不例外,对于靠写作谋生的萧红,可谓前途渺茫。在此期间,她接到来自北平朋友的信件,她整理后以《来信》为题发表在1937年《中流》第二卷第十期。萧红借他人之口再次强调作家岗位的重要性:吟借给我的两部书,因为担心它们的命运,今天寄出给你们了,和土地比起来,书自然很微小,但我们能保卫的,总不要失去。

武汉战事不明朗,《七月》同人接受山西民族

革命大学的邀请,随流亡武汉的青年大队人马撤往临汾。1938年1月27日,列车停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西边一个运载货物的小车站,武汉《七月》同人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聂绀弩、艾青、田间等乘坐一列装载货物的铁篷车,前往山西。

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聂绀弩与萧红小说学

1938年3月初,萧红等人抵达西安,住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前往西安的火车上,她与塞克、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创作了话剧《突击》。《突击》在西安公演3天,场场爆满,剧组创作人员还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可以说,西安是萧红独立作家身份再次彰显,以及和萧军分手的见证地。在这里,她住了一个春天。她与丁玲互相倾诉,一同歌唱,开怀痛饮,共度风雨之夕;也与老朋友聂绀弩探讨她的小说学理论。

在西安,萧红与聂绀弩看似漫不经心的聊天相当说明问题,为她与萧军分手的过程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轮廓。聂绀弩的《在西安》里,披露了临汾车站萧军留下打游击,将萧红托付给他的一次谈话。在此前,萧军也把萧红托付给丁玲,希望萧红能够去延安或留在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里。那么萧军是如何将萧红托付给聂绀弩的呢?

夜晚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单独和聂绀弩一起在月台上闲聊。他认为临汾是守不住的,聂绀弩等人此行是不会再返回临汾的,他说自己身体好可以上五台去参战。聂绀弩问及萧红怎么办时,萧军希望借此分手的决定还是让聂绀弩很吃惊。萧军和聂绀弩的谈话是这样的:“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以后你们……”“她单纯、醇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怎么,你们要……”“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6] (P128)}

在西安正北路,月色朦胧,萧红歪戴着毡帽,

和聂绀弩边走边聊。萧红之所以和聂绀弩谈到萧军,盖因为鲁迅先生第一次请两萧在梁园豫菜馆吃饭时,聂绀弩就在座,他是萧红、萧军的老朋友。正如萧军所言,萧红和聂绀弩最好,所以放心地把萧红托付给他。萧红也是离意已决:“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6] (P128)}不可避免地,萧红谈到萧军在上海与许粤华的恋爱。这件事正如萧军自己猜测的那样,确实是伤了萧红的心,成为萧红下决心分手的导火索。她开始否定自己过往的做法,剖析女性的弱点,希望能够飞翔,但也不能确定结局如何。“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6] (P129)}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对于想打游击的萧军,萧红有规劝,但是萧军执意打游击。两人有过这样的谈话:“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好的。”^[7]萧军向萧红表达的离意非常明确,尽管聂绀弩一再提醒萧红,不要与萧军分手,但萧红此时已不想延续这段姻缘了,她希望自己以独立姿态立身于文坛。

在西安,聂绀弩和萧红还作过一次关于小说学的畅谈。这篇谈话录,1981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萧红选集》中以《序》的形式发表。萧红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以“萧红式”思维,鲜活生动跳跃式地浮出,以连续不断的蒙太奇式的影像方式给人以震撼。她的口吻,似活脱脱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精灵!

在天才问题上,萧红是这样回答的“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8] (P2)}

在散文家小说家问题上,对于聂绀弩说“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萧红的情绪更为激烈“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我说过这话么?”“说不说都一样,我已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又为什么这样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我并不这样。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8] (P3)}

从日本回上海后,萧红满腔热情地准备在文坛大展拳脚,这番雄心壮志,胡风夫人梅志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对萧红而言,身边日积月累的轻视来自于萧军及其朋友,他们对萧红真挚的情感和日渐提高的创作水平熟视无睹,为她以他人为重的心甘情愿付出的交往方式,不加以珍惜,使得她对萧军及其朋友失望至极。以至于当端木蕻良走近她身边,并对她的作品和才华大加赞赏时,孤立无援的萧红,决定与端木蕻良结盟,在创作上再行超越。正如她对聂绀弩所言“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三、全面抗战爆发:萧红性别立场确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居于上海吕班路的萧红,眼见着天空有飞机掠过,战争就在身边。与普通百姓一样,她也分不清天空中的飞机是我机还是敌机,终日处于对战事的猜测中,生活无着无落。

萧红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她与萧军百无聊赖的日子。萧军和她谈起自己的一些旧友,引发

了萧红关于性别的感慨。萧红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也有像萧军那样的对朋友的思念。但是,人“一做了女人,便没有朋友。但我还有三五个,在满洲的在满洲,嫁了丈夫的,娶了妻子的,为了生活而忙着的,比方前两天就有一个朋友经过上海而到北方战地去。”^[9]这三五个朋友,是萧红作为在社会上活动的女作家,与一般家庭妇女的不同之处。在男权社会,不仅家庭妇女守着妇道,以丈夫的朋友为朋友,以丈夫的敌人为敌人,连作家萧红也会因为萧军的缘故,而失去自己的朋友。譬如萧红因萧军插足黄源家庭而失去了黄源这个朋友。萧红从朋友角度切入,与萧军对比,旨在说明男女本应是平等的。可是,事实上男人在社会上表现强势,女人却无法独立。这样不公平的待遇让萧红愤愤不平。

萧红不赞成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束缚,她也不想依附某个男人。在武汉期间,萧红读了一些书,尤其是读了外国女作家的书,激发了她潜在的女权意识。在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中,萧红借美国女作家史沫特烈的《大地的女儿》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动乱时代》,明确了自己的性别立场。她认为女性地位卑微是世界性问题。对丽洛琳克的勇敢和史沫特烈的健康开朗,她是极为欣赏钦佩的。但萧红不认同丽洛琳克主动欺负别人的观点,倾向于认同史沫特烈。她认为史沫特烈的小说写出了“男权中心社会下的女子,她从她父亲那里就见到了,那就是她的母亲”^{[10] (P186)},父亲送史沫特烈母亲花绸子,没有得到感谢,就呵斥母亲。萧红评论说:“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的。她哭了,眼泪就落在那张花绸子上。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白得,那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和眼泪。”^{[10] (P187)}

中国女性在社会上真正获得独立存在的形象,起于“五四”运动。萧红是“五四”的女儿,在萧红时代,多数女人没有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从在哈尔滨时,萧红就靠写作生存,萧红作品非常超前地表现出性别立场,她在《广告副手》^{[10] (P14)}中,直接切入电影院经理姨太太对画广告的萧红的不屑一顾,认为女人应该依附男

人,出来工作的女人太笨拙了。萧红为了写作,为了有一个独立的经济地位忍痛将女儿送人。如此惨烈经历,使她对写作不敢轻言放弃,甚至有一种“宗教式”的敬畏。因此在战乱中,她在上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量的刊物都停刊了,切断了她的生活来源,也冲击了她一向引以为傲的作家思考场域。她与有同样问题的女人聚集在一起,谈论工作的丧失和未来的打算。

武汉,如同一个崭新的天地,重启了萧红的写作生活。她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不断地强调独立作家身份。这既是与男权中心象征人物萧军进行的彻底的角色切割,也是为今后能够轻装上阵,更好地实践自己“对着人类的愚昧”创作主张进行的铺垫。

参考文献:

- [1] 胡风. 七月社明信片 [J]. 七月, 1937 (1): 21.
- [2] 胡风. 致读者和作者 [J]. 七月, 1937 (1): 22.
- [3] 胡风. 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代致辞 [J]. 1937, (1): 1.
- [4] 章绍嗣. 武汉抗战文艺史稿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8. 5.
- [5] 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纪录) [J]. 七月, 1938 (7).
- [6] 聂绀弩. 在西安 [A]. 王观泉. 怀念萧红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 [7] 萧军. 从临汾到延安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2.
- [8] 聂绀弩. 萧红选集序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9] 萧红. 八月之日记一(下) [N]. 大公报副刊“战线”, 1937-10-29.
- [10] 萧红. 萧红全集(第4卷) [M].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Xiao Hong's Awareness as Independent and Female Writer

GUO Shu-mei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 150018, China)

Abstract: Lugouqiao incident on July 7th, 1937, the moment when the anti-Japanese war unfolded on a large scale, was the milestone of Xiao Hong in light of her awareness as a dependent writ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her writing style. The 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writer was closely related to Xiao Hong's feminist viewpoint, which was essential for her split with Xiao Jun and influenced her later writing. Xiao Hong proclaimed about her literary view in Wuhan "writers do not belong to any class, they belong to the whole mankind. No matter in the past or at present, writers have been writing and should write the ignorance of human being." Later on, either in wartime or in Hong Kong, she always practiced this conviction.

Key words: the "July" Seminar in Wuhan; studies of Xiao Hong; gender perspective; awareness as independent and female writer

(责任编辑 赵莉萍)